

ZHONGHUAWENMINGYUANLIUXINTAN

中华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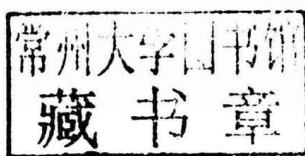
■ 蒋南华 / 著

源流新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明源流新探

蒋南华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明源流新探 / 蒋南华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221 - 10722 - 0

I. ①中… II. ①蒋… III. ①中华文化 - 文化起源 - 文集 IV. ①K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9419 号

中华文明源流新探

蒋南华 著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责任编辑	程亦赤 龙建人
封面设计	熊 锋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10722 - 0 定 价: 38.00 元

内容简介

300万~500万年以前,我国西部以昆仑为中心的广袤地区,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后来由于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变化,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早期直立人),便沿着长江、黄河等江川河流作扇形似的扩展与递迁。今天我国西北的黄土高原、西南的云贵高原以及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留下了他们及其后裔的光辉足迹。

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湘西、鄂西南和黔东所属的武陵古黔中地区发现了距今50万~1万年以前的数百处古人类文化遗址(其中常德、怀化和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内就有248处以上)。特别是距今1万~5000年左右的夏代以前的彭头山城背溪文化(11000~7600年)、高庙皂市下层文化(7800~6800年)、汤家岗文化(6800~6300年)、大溪文化(6300~5300年)、屈家岭文化(5500~4800年)、石家河文化(5000~4300年)及后石家河文化(4300~4200年)等文化遗址及其居民聚落、城池和数以万计各种文物的出土,充分证实:以常德为中心,地跨湘鄂川渝黔等省市的武陵地区,是中华文明极其重要的发祥地。7800年前的伏羲太皞和六七千年前的炎帝神农、黄帝轩辕、战神蚩尤、少皞青阳、高阳颡顼、帝喾高辛和共工及唐尧与虞舜等人文之祖和创世英雄均生于斯、长于斯或兴于斯。他们为构建和创造中华文明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伟大篇章。

本书以中华文明源流概述、炎帝神农与中华文明、伏羲炎黄生平事略、伏羲炎黄尧舜故里、战神和梅山文化始祖蚩尤、水族始祖

共工及其族源、常德武陵中华文明圣地、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与瑰宝——连山、归藏和周易、二十四节气始起年代以及《山海经》、《尚书·尧典》、《夏小正》与《月令》的用历、古文《尚书》真伪、水文、水历、彝历的制历年代,等等为篇章,运用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天文历点记载(即三证合一)三个方面的材料,对中华文明的源流(重点是源)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提出了中华文明之源为常德武陵地区的新说。同时还根据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天文历点记载,对伏羲、神农、黄帝、蚩尤、少昊、颛顼、帝喾高辛、共工和尧舜禹等中华人文之祖的生平事绩及其生卒年代进行了推算和论述,提出了令人无可辩驳的结论。

目 录

中华文明源流概述	1
炎帝神农与中华文明	8
伏羲炎黄生平事略考	16
伏羲炎黄尧舜故里考	33
战神和梅山始祖蚩尤	53
常德为中心的武陵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圣地	63
武陵黔东——贵州文明的发祥地	77
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瑰宝——《连山》、《归藏》和《周易》	85
北斗星是古人心目中的历书和钟表	97
“星期”记日是我国对世界用历的最早贡献	102
二十四节气的起始年代	109
《山海经》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	117
《尚书·尧典》、《夏小·正》和《月令》浅说	126
彝族历法研究	132
三星堆文化源流初探	141

水族源流考	150
水族始祖共工及其族源新考	167
水历是中华远古历法的“活化石”	177
水文是一种比甲骨文更早的远古文字	187

郎岱——夜郎宗长国都邑的简称	196
论古夜郎都邑及其与荆楚、巴蜀之关系	201
附录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出夜郎研究的误区	209
附录二：湖南之最——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	214

古文《尚书》真伪考	227
中华传统文化与道德建设——论孝悌	237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民俗节日礼仪	244

附 录

为民族文化寻根溯源	253
追寻中华文明七千年	256
伟哉！中华文明	260
解决古代断代问题的钥匙	263
《中华传统天文历术》读后	266
苗楚文化研究的可喜收获	268

中华文明源流概述

大约在300万~500万年以前,人类的始祖早期直立人,就生活在我国西部北回归线23~40度,东经75~105度,即以昆仑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当时那里地势平坦,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生长繁茂,是一片生意盎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沃野。后来,由于地壳的运动以及向北漂浮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大陆板块的撞击与挤压,致使我国西部地面峭然成皱褶式隆起,形成了山脉和河流均呈东西走向和西高东低的倾斜地势。

由于地形地貌的改变(如喜马拉雅山、秦岭与祁连山等山脉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以昆仑为中心的地域,渐渐变得不太适应于人类生活和繁衍的需要,于是“人们”便怀着对故土的留恋之情,开始向四周进行扇形似的扩展与递迁。中华民族的始祖就是从昆仑沿着长江和黄河等水系逐渐向东迁徙和拓展的。因思乡恋祖等人类固有的自然心态所致,从“昆仑”走下来的我国远古先民,便一代接一代地传授和讲述着“昆仑”那片曾哺育过自己的神奇而美丽的土地,怀念着那里的美好生活。于是昆仑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地,成了神话和传奇故事的中心话题。四五千年之前的夏代奇书《山海经》和两千多年前的《淮南子》均对“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和“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以及“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沙棠、琅玕……绛树……碧树、瑶树……九井玉横……倾宫、旋宫、悬圃……”“品物群生,稀奇特出”,“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万物尽有”的“帝之下都”,即“海内昆仑之虚”感到无限神奇而令人神往。

今天我国西北的黄土高原,西南的云贵高原以及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都留下了从能人(即开始会直立行走和保存、使用火的早期人)到直立人的

光辉足迹。200万~300万年以前生活在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鄂西建始人(250万年)、重庆巫山人(206万年前)、安徽繁昌人字洞人(240万年前)和河北阳原的大南沟人(300万年前);100万~200万年前生活在云南的元谋人(178万年前)、陕西蓝田人(115万年前)、陕西葛城西侯度人(180万年前);河北阳原小长梁人(160万年前);50万~100万年前生活在上述地区及其毗邻地区的北京人(80万~90万年前)、湖北郧县人(100万年前)和郧西人(80万年前)、南京汤山人、广西百色人(78万年前)、贵州黔西观音洞人(50万~60万年前)都是铁证。20万~50万年以前的安徽和县人(30万年前)、贵州水城人(13万~24万年前)、鄂西古封村人(20万年前)、福建三明人(20万年前)开始由直立人进入“智人”(即现代人)的早期阶段。开始了打制骨角器,制造细石器和广泛运用人工取火。陶器制作的兴起,原始农业与养殖业的出现,为人类向文明社会迈进开启了滥觞。5万~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如广东的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贵州的桐梓人、水城人和盘县大洞人、陕西的丁村人和许家窑人、陕西的大荔人、安徽的巢县人、辽宁的金牛山人等)已遍及中国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从西部高原到东海之滨;从塞北江南到东南沿海和台湾等地,他们为中华文明的缔造奠定了雄厚的基石。而1万~5万年以前的晚期智人,如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广西的柳江人、山西的峙谷人、四川的资阳人、内蒙的萨拉乌苏(即河套)人、山东的新泰人、辽宁的建平人、云南的丽江人、呈贡龙潭山人、西畴人和台湾的左镇人、长滨人、贵州的兴义人、普定穿洞人、桐梓马鞍山人、六枝桃花洞人、白岩脚洞人、安龙观音洞人、福洞人、长顺青龙洞人、河北虎头梁人、东北海城小孤山人、哈尔滨阎家岗人、吉林延吉安图人、湖北房县樟脑洞人、江苏大贤庄人、四川汉源富林人、广西桂林宝积岩人、柳州白莲洞人、重庆巫山河梁人、江苏下草湾人、溧阳神仙洞人、丹徒高资人等等,他们已开始从穴处群居的群婚生活走向地面,用木石建造干栏式、石垒式和土筑式的房屋,开始了聚落式的对偶家庭生活并开始了陶器制作和原始农业生活。两三万年前山顶洞人的骨针和贵州普定穿洞遗址两支针尖锋利、一端扁平而钻有小孔的精致骨针的发现,无疑是那时已出现了缝纫技术的铁证。而安龙观音洞遗址出土的一件利用肋骨的自然曲度刮削成鸟的腹部、背部和尾部而头呈三角形的鸟类,可谓是一件形象生动逼真的原始艺术珍品,堪称我国雕刻艺术之祖。山顶洞人在亲人墓葬的尸体上洒上红磁铁矿粉和其他装饰品,则是其审美观念和宗教意识的真实反映。

最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湘西、鄂西南和黔东所属的武陵黔中地区,如津市虎爪山(50万年)、新晃大桥头(35万年)、靖州二砾石、澧县鸡公

档(25 万年)、石门王家山(15 万年)、长阳伴峡洞(13 万年)、会同坛子墙(10 万年)、石门燕儿洞(5 万年)、沅陵丑溪口(3 万年)、辰溪仙人湾(2 万年)、洪江黔城倒水湾和沿河和平镇、松桃虎渡口、天柱白市、江东、远口镇及锦屏茅坪镇等地,分别发现了 50 万年、35 万年、25 万年、15 万年、13 万年、10 万年、5 万年、3 万年、2 万年、1.5 万年和 1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数百处古人类文化遗址(有学者统计:近 20 年来,距今 1 万~30 万年的旧石器遗址,仅今怀化市境内的 12 个县就发现了 113 处,常德地区发现了 50 多处,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发现了 85 处),出土了大量的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和石铲、石钻等石器以及蚌刀、蚌挂饰和骨针、骨刀、骨铲、骨耜、骨镞等骨器及木棒、木耒耜和夹砂陶、泥质陶等烧制的手工陶器,如杯、盘、碗、钵、罐以及竹类编织物。在常德武陵地区还普遍发现了距今 1 万年左右到夏朝以前的相当密集,其年代相续不断的彭头山城背溪文化(距今 11000~7600 年);高庙、皂市下层文化(距今 7800~6800 年);汤家岗文化(距今 6800~6300 年);大溪文化(距今 6300~5300 年);屈家岭文化(距今 5500~4800 年)以及石家河文化(距今 5000~4300 年)与后石家河文化(距今 4300~4200 年)的数百个文化遗址及其居民聚落、窖穴、房屋、城池、壕沟、灰坑、墓葬以及石铤、石斧、石铲、石刀、石锄、石凿、石钻、钻镞、石磨盘、石磨棒、石网坠等磨光石器、象牙雕刻与玉璜、玉钺、玉玦、玉环、玉管、玉簪、玉珠、玉镯等玉制品以及木杵、木耒、木钻和骨刀、骨针、骨镞、骨簪、骨铲、骨耜、骨匕首、骨牌饰与蚌刀、蚌钱贝、蚌挂饰,出土了用夹砂红褐陶、泥质褐陶、灰陶、黑皮陶、白衣红陶、夹细砂白陶和白陶并绘有绳纹、带状纹、波纹、戳印纹、篦点纹、鸟纹和双线或单线刻划纹、带状方格纹等各种纹饰、各种器形的手工或轮制的陶罐、陶盆、陶钵、陶碟、陶杯、陶碗、陶壶、陶盃、陶盂、陶缸、陶鼎、陶甑、陶豆、陶鬻、陶甗、陶簋、陶屋和陶猪、泥塑狗等儿童玩具。此外,还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稻谷、米粒等人工栽培稻的稻作遗存、植物种子和猪、牛、羊、狗、鸡、鸭等家禽家畜遗骸以及耒、犁、刀、锄、镰、铲等农具和船桨、船橹和平底木板风帆船等水上交通工具。并在常德临澧竹马村发现了 1.8 万年前的的高台式木建构房屋;在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 1.5 万年左右的人工栽培水稻和烧制陶器及原始编织物;在常德澧县彭头山和梦溪八十档等地,发现了距今 9000 来年的修筑有围墙和壕沟的村民聚落遗址和绘有绳纹、刻划纹等的各种形制的陶器,以及木制、骨制、陶制的各式生活用具和猪、水牛等家畜遗骸。此外,还发现了世界最早的稻田和大面积的人工稻作遗存以及数以万计的保存完好的稻谷颗粒和陶器、木器、麻绳、芦席、箩筐及用牛骨、猪骨制作的生产工具。

在距今 7800 ~ 6800 年的怀化洪江高庙遗址,出土了晶莹剔透、精美绝伦的各种玉器(特别是玉璜、玉钺)、陶器、象牙雕刻和竹席等精细手工编织品;发现了略呈八字形的“双阙”式宫殿和二排或三排间的楼房建筑、大型祭坛、窖穴和夫妻合葬墓;出土了我国最早的白陶和用朱红色或黑色矿物颜料描绘在陶器上的八角星图(即连山八卦与天文图像)、太阳神鸟(凤凰)、獠牙神兽图案和平底木板风帆船及文字符号;出土了以猪为主的牛、羊、鸡、鸭等家禽家畜遗骸。在高庙附近的会同连山乡还出土了一尊头顶上刻有意为“马猴王”三字(即女娲“狙尾氏”)的石头神人像。

在距今 6500 ~ 8000 年的常德澧县梦溪三元宫等地的居民聚落遗址,出土了各种玉器、陶器(如轮制薄胎黑陶蛋壳杯、朱绘和兰纹彩陶等器具)、酒器、木器、骨器、陶纺轮和麻绳、芦席、竹筐等千余件,以及大量的人工栽培稻遗存、植物果核、动物遗骸和 47 种植物种子。在澧县宋家台遗址,还发现了红烧土房基、土墙和排水沟……

在距今 6000 年的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有护城河、城墙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街道和排水系统等设施齐备、功能完善,城区面积达 22 万平方米,城垣内面积近 9 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市,发现了祭坛及其寓意诡谲、形同浮雕图案的艺术神器。出土了玉璜、玉钺、玉环、玉镯等精美玉制品和陶碗、陶杯、陶钵、陶罐、陶盂、陶缸、陶釜、陶鼎等白陶、磨光红陶、彩陶器物以及刀、锄、斧、铲、耒、耜等木、石、骨制乃至金属劳动工具和船艄、木桨、船槽等水上交通工具。此外,还发现了人造稻田、水塘、灌渠等近乎现代农村的农业基础设施。

在距今 6300 ~ 4800 年的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不仅出土了 3000 多件石犁、石斧、石铲、石锄、石镰、石铤、石矛、石凿、陶纺轮、骨镞、骨锥、蚌器等生产工具,还出土了大量的水稻颗粒和大型陶瓮、陶罐以及彩陶用具,包括炊具、食具、葬具、贮藏容器等等。有的陶器还贮存着粟和黍类粮食。最引人注目的是民居房屋建造技术技艺精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民居建筑多为套间,最多的有七套间,面积多达 100 多平方米,几乎与现代民居没有多大区别。石灰建材及优于石灰、其性质类似“水泥”的混凝土的应用,推拉门的发明使用……特别是使用火烧而建造的赤色“砖房”建筑,更是令人惊叹!地面用火烧烤,使之结成坚硬的表层,达到了今日水泥地面的使用效果;墙体用木条做骨架,涂抹泥层后,经火烧烤,整个房屋通体经火烧成一个整体。火候均匀适度,坚固耐用,防水防潮,经过 5000 多年的自然侵蚀,至今仍可观其原貌,这实在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一座丰碑。

在距今 5300 年前始建的湖北和湖南交界的石家河古城及其周边的十

余座卫星城,发现了玉器作坊、红陶杯生产基地和陶器、陶纺轮等专门生产场所及墓葬区等等。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杯、陶缸、陶鬲、陶鼎、陶鬻、陶罍、陶罐、陶擂钵等日常生活用具以及铜器和石灰、水泥质样的建筑材料,出土了璜、玦、管、斧、刀、钻、凿、铍等大量精美玉器以及玉虎、玉龙、玉凤、玉鹰、玉蝉等动物玉饰制品和玉神人、玉牙璋等玉礼器;在城区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墙南北长1200米,东西宽1000米,城墙底宽50米,顶宽8~10米,墙高5~6米并有城壕防护的中心城,还发现了大型祭坛、石钺和大型筒形祭祀器“陶祖”和刻有太阳神鸟(凤凰)、獠牙神兽、八角星图及文字符号的套缸等“陶祖”象征物和面部长有獠牙、双耳附有长尾鸟(凤凰)、头上戴着刻有平行条纹和回水波纹帽(显系水族始祖共工)的玉神人。

除此以外,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还在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了距今2万~1.5万年的文化堆积物。其中有距今0.9万~1.4万年的陶片和类似水稻的扇形体,在广西邕宁顶狮山、柳州鲤鱼嘴、桂林庙岩、河北徐水南庄头、山西怀仁鹅毛口、北京怀柔转年和门头沟东胡林等地发现了距今7000~12000年的文化遗存,出土了原始陶残片、磨制石器和人工驯养的家畜——狗和猪……

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40多座房基、300多个窖穴、10多座陶窖、300多座墓葬和数千件陶器、石器、骨、甲器以及光滑晶莹的七音阶骨笛,等等,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稻谷。

在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不仅发现了大面积的干栏式榫卯木建构的房屋建筑、陶器日用品(如陶鼎、陶釜、瓦甗、陶盆、陶碗、陶杯……有的鼎罐中还残存着稻米锅巴和饭粒),和制作精美的木、石、骨质工具、乐器骨哨以及纺织、髹漆等工艺品,与木胎漆碗、象牙雕刻小盅、象牙雕刻蝶形器和总量在120吨以上的稻谷遗存。象牙小盅的盅壁上还刻了四条宛若蠕动的家蚕。此外还发现了猪、牛、羊等家畜骸骨和刻有花纹的精致木桨及柳叶形骨镞和鱼、鳖、鲨、鲸等海洋生物的遗骸。充分说明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已出海打鱼,过上了“稻饭鱼羹”的温饱生活。

在距今5300年的江苏新沂的花厅遗址,出土了制作精美、色泽光润,由玉环、玉璜等组成的头饰和由绿松石、软白玉制作的耳坠、玉镯、玉柄饰以及由白色小玉珠、半圆形大玉佩、琮形管、冠状玉佩、弹头形玉管和白色软玉或淡绿、淡黄色软玉精雕细琢的玉串饰等艺术珍品。在湖南道县鬼崽岭(即离九嶷山舜帝陵3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数量巨大、工艺独特,其制作年代距今5000年前的石像群以及白象庙和禹王庙等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的世界又一大奇迹。

除此,考古工作者还在距今 6000 年前的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了罗纹编织物;在五六千前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先民们加工抽丝剩下的半个蚕茧;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了一块绢片和一些丝带与丝线。令人惊叹的是经纺织专家鉴定,这款绢片经纬平直而均匀,密度为每厘米 40 根,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在马家浜、良渚和崧泽文化遗址出土了以玉琮、玉璧等祭祀天地神灵礼器为骨干的各种玉器,其磨砺之精美,雕刻之细密,已达到了当今顶级玉雕艺人也深感惊奇和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七八千年前的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和五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浙江良渚、湖南与湖北交界的石家河古城、山西的陶寺和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陶器等器物上,发现了一脉相承的文字刻画符号和文字并在山东邹平丁公村出土的一块陶片上发现了 11 个排成 3 行的成篇文字。在陶寺遗址还发现了 280 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和宫殿区,出土了两个珍贵的彩绘龙盘和青铜容器残片。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黄铜片,在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家窖遗址发现了青铜小刀,在陕西姜寨遗址发现了残铜片;在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 50 多件铜器,器型包括刀、凿、锥、带釜釜和铜镜……此外,据万历《慈利县志》和同治《直隶澧州志》等记载及近年考古发现:在常德武陵地区的澧县崇山出土了 4000 余年前的欢兜铁鼎、铁锄和金甲;在石门皂市镇遗址出土了熔铜炉、铜块、青铜提梁卣和父乙簋;在桃源出土了青铜方彝盖和皿天金方彝;在宁乡炭河里出土了四羊方尊、人面方尊、戈卣、象纹大铙、青铜兽面提梁卣……此外还在“蛮王故居‘九岭十八坡’(发现了)遍布(各地的)古代炼铁厂、木炭窑遗址”(李新吾等《梅山蚩尤文化研究》一、二、三集,冷水江市政协文史委编,2004 年)。

距今 10000 ~ 5000 年以前,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发展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水平,特别是六七千年前的炎黄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英雄时代。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出现了围墙、壕沟、城池、道路及排水系统等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大型都邑和居民聚落以及工艺成熟的干栏式榫卯结合的房屋以及宫殿和楼房建筑;出现了分工明细的制陶、制革、制骨和玉器及象牙雕刻等手工工场;出现了桑蚕、纺织;出现了酿酒作坊和家禽家畜饲养;出现了骨笛、骨哨、玉笛等七音阶乐器、舞蹈和绘画、雕刻等等较为成熟的艺术;有了车、船等水陆交通工具及铜矿等金属冶炼技术,有了刻划符号和文字等语言载体;形成了南稻北粟格局分明的水旱农作区。水乡居民已过上了“稻饭鱼羹”的温饱生活。正如宫玉海先生在其《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一书中所说:“五千年

以前,中华文化(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总而言之,距今一万年以前我国先民就开始构建中华文明的大厦: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到塞北江南,长城内外;从西部高原到东海之滨;从西南到东北;从松辽平原到南岭沿海、福建、台湾等地,形成了以长江为轴心的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城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钱山漾文化、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以及东南沿海的昙石文化、石碇文化、台湾园山文化、凤鼻头文化,广西桂林顶狮山、甑皮岩文化和以黄河为轴心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后李文化、北辛店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和昂昂溪文化,等等,即形成了以长江为轴心的南方文化和以黄河为轴心的北方(亦即中原)文化两大文化区。随着南北两大区域文化的发展和相互交融与碰撞而形成了世界上最悠久、最光辉、灿烂、无与匹对、独领风骚的中华多元一体文化。

参考文献

- [1] 拙著《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人民出版社,2002。
- [2] 《人类起源在亚洲》,《资料卡片杂志》1998年第1期。
- [3] 《山海经》、《淮南子》。
- [4] 宫玉海:《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 [5] 蒋迎春:《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新华文摘》1995年第4期。
- [6] 李新吾等:《梅山蚩尤文化研究(三)》,冷水江市政协文史委编。
- [7] 《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 [8] 林向:《近年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光明日报》,1999年7月9日。
- [9] 刘庆柱:《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光明日报》,1999年1月7日。
- [10] 《淮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金陵晚报》,1999年5月20日。
- [11] 陈建明主编:《湖南十大考古新发现陈列》,湖南省博物馆。

炎帝神农与中华文明

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中华文明之滥觞始于炎帝,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然炎帝神农是什么时代的人?中华文明始于何时?对此,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说:炎帝神农是五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中华文明五千年。有专家分析推测,认为中华文明史才四千余年,离五千年之说还差二三百余年呢!也有说中华文明史为六千年和七千年的……我们用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古天文历术及其历点推算、论证,得炎帝神农生于公元前 5080 年辛巳,殁于公元前 4960 年辛巳。炎帝神农是七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中华文明史至少有七千年。

炎帝神农时代发明创造文字、八卦、天文历法和稻作农耕,主稼穡、栽五谷、种果蔬、植桑麻、兴茶饮、制耒耜、作陶冶斤斧锄耨、织布帛、造舟楫、修台榭、建明堂、制琴瑟、开商贸(“日中而市”)……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传统框架和基本体系,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滥觞,为中华文化最早屹立于世界民族文明之林,建起了一座光耀千秋、传承万代的灯塔。

一 炎帝神农的生活年代

炎帝神农号烈山氏,亦曰连山氏,姜姓。《帝王世纪》曰:“其母任姒,有娇氏女,名曰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凡八代及轩辕氏也。”如此,则炎帝神农生于何年?卒于何年?我们根据炎帝神农“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始作八卦”(《周易·系辞》),“正节气,审寒暑”(《事物纪原·正朔历数部》),“正四时之制”(《尸子》)和“分八节,以始农功”(《晋书·律历志》),创“上元太初历”亦即“天元甲子历”(《汉

书·律历志》)以及《通鉴外纪》关于炎帝神农崩于“帝临魁元年辛巳”和“在位一百二十年”的记载,可以推断炎帝神农生年必是其创制天元甲子历那一年以前的辛巳年。我们知道炎帝神农创制的“天元甲子历”是一部“历元”,始于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合朔并交冬至”(冬至点为牵牛初度)的历法(其历元数次均始于“0”,这是制历的准则)。我们用古代四分历术和司马迁《史记·历术甲子篇》所提供的原理、方法和数据,推得这个“天元甲子历”始创于公元前5037年之甲子(见拙著《中华传统天文历术》,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这就告诉了我们:炎帝神农的生年必是公元前5037年以前的一个“辛巳”,即早于公元前5037年43年的公元前5080年辛巳年。炎帝神农活了120岁。其崩年“帝临魁元年辛巳”,必是公元前4960年($5080 - 120 = 4960$)^[1]。我们推得的这个炎帝神农的生卒年代(公元前5080年辛巳至公元前4960年辛巳)是否确实可信?我们可以根据以下若干史实及有关年代来加以验证。

《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索隐》云:“炎帝中间凡隔八代,五百余年。”(或曰五百三十年,或曰五百二十年)。《周易·系辞》疏:“炎帝神农姜姓也……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訖,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衰,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也。”又曰:“黄帝有熊氏……在位一百年崩。”(《史记·集解》皇甫谧曰:“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岁”)《通鉴外纪》曰:“帝临魁元年辛巳,在位六十……次帝承元年辛巳,在位六年或云六十年(经考订当为六十六年);帝明元年丁亥,在位四十九年;帝直元年丙子,在位四十五年;帝厘,一曰克元年辛酉,在位四十八年;帝衰元年己酉,在位四十三年;帝榆罔元年壬辰,在位五十五年。自神农至榆罔四百二十六年(经考订当为四百八十六年)。”《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颡顼。”《史记·集解》皇甫谧曰:“颡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礼记·月令·孟冬之月》疏:“(颡顼)二十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史记·索隐》)

《帝王世纪》还说:“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子青阳代之,是为少昊……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少昊早年曾“孺”韩流之子颡顼,“于东海之外,少昊之国”(《山海经·大荒东经》)。“及少昊之衰也,颡顼受之”(《国语·楚语下》),而“颡顼乃代少昊”(《左传·昭公》)而立“七十八年”后即于“岁在鹑火”之年去世。颡顼去世后其继承者为“黄帝之曾孙”高辛(实为黄帝曾孙之后)。“帝誉高辛者”“年十五而佐颡顼,三十登位都亳。”(《史记·正

义》)《史记·集解》皇甫谧曰:“(帝啻高辛)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

根据上述记载,如颡顼“岁在鹑火而崩”,我们即可用古代的岁星纪年法推得:公元前4393年为“岁在鹑火”之年。是年颡顼逝世。颡顼活了“九十八岁”,二十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那么他的生年必是公元前4491年($4393 + 98 = 4491$);其在位之年必为公元前4471年至公元前4393年($4491 - 20$)。

从史籍记载得知:颡顼是继少昊而立的。“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而崩”后颡顼“乃代少昊”为帝。这就是说颡顼即位元年公元前4471年,即为少昊卒年。而少昊曾“在位八十四年”,如此则少昊继黄帝而立之元年必是公元前4555年($4471 + 84 = 4555$)。此年就是“黄帝在位百年而崩”之年。黄帝活了“百一十一岁”(《史记本纪·集解》),则黄帝之生年必为公元前4666年($4555 + 111$)。公元前4393年既然是颡顼“岁在鹑火而崩”之年,是年帝啻“高辛,三十(而)登(帝)位,都亳”(《史记·本纪·正义》),“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史记·本纪·集解》),如此我们即可推知:帝啻高辛生于公元前4428年($4393 - 70 + 105$),卒于公元前4323年($4393 - 70$)。

从《通鉴外纪》“帝临魁元年辛巳”为公元前4960年等推知“自神农至榆罔四百八十六年”之间各帝的具体年代是:帝承元年辛巳为公元前4900年($4960 - 60$);帝明元年丁亥为公元前4834年($4900 - 66$);帝直元年丙子为公元前4785年($4834 - 49$);帝厘元年辛酉为公元前4740年($4785 - 45$);帝哀元年己酉为公元前4692年($4740 - 48$);帝榆罔元年壬辰为公元前4649年($4692 - 43$)。“榆罔在位五十五年”即被黄帝轩辕氏所灭,则榆罔被灭之年当是公元前4594年($4649 - 55$)。这就是说黄帝灭榆罔时,已年逾古稀,即72岁了($4666 - 4594$)。黄帝活了“百一十一岁”。这时离他去世之时还有39年($111 - 72$)。

这样,我们还可从帝啻高辛的卒年公元前4323年起,用逆推法,推出炎帝神农的生年,即: 4323 年+高辛在位之年70+颡顼在位之年78+少昊在位之年84+黄帝灭榆罔后的在位之年39+自神农到榆罔486=5080(年)!

以上推得的炎帝神农生卒之年(公元前5080至公元前4960年),我们还可以用出土文物的年代和历史文献加以印证:

1.《汉书·历律志》等记载:黄帝于“闾逢摄提格中(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继“上元太初历”之后调制了“天正甲寅历”。我们用古四分历术推得黄帝调制的这个“天正甲寅历”始于公元前4567年之甲寅。它比炎帝神农创制的“天元甲子历”晚了470年($5037 - 4567$),是他灭榆罔之后27年所为($4594 - 4567$)。